

儒家文化经典导修

主編傅志明意者，先致其知；致

—
儒家文化经典导修

—
主编／傅志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化经典导修/傅志明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209-05893-3

I. ①儒... II. ①傅... III. ①儒家-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B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610 号

责任编辑: 袁丽娟

装帧设计: 张晓曦

儒家文化经典导修

傅志明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 (185mm×260mm)

印 张 24.5

字 数 400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893-3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633)8221365

“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编委会成员

总 策 划	刘传庚			
编委会主任	杨家珍	傅志明		
编委会成员	刘克苏	桑绍龙	刘甲朋	刘亚杰
	孙维屏	王 琪	孙 菲	朱 婧
	吴树勤	房秀丽	董月仙	李 岩
	刘 敏	贺继红	司千字	崔 沪
	江 伟	俞国方	曲 琨	彭玉美
	温秀珍			

总 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高等教育自 1999 年扩招以来，开始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近年来毛入学率达到 24% 以上，在校学生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终身教育理念作为重要指导思想，把学习型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确立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各个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任务，明确要求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和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广大适龄青年“学有所教”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就学层次提高、就学渠道增加，主道宽敞、岔道众多的教育道路网络逐渐取代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家政治、经济、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不仅追求“有学上”而且还要“上好学”，可以说，无论是学生本人、家长，还是用人单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大学教育所具有的价值，更加注重在大学里究竟能够学到什么，更加注重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对学生个人未来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对企业与社会有什么意义。近年来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除了对教育公平有了更高的诉求之外，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有了更高的期许，特别是扩招导致在校生规模迅速增加、教学资源相对匮乏、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加大等问题逐步凸显之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注越来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怎样培养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怎样培养人是各类教育始终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重大问题。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问题，是一切教育活动的立足点和最终归宿之所在，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人才培养路径和模式的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高等学校内部治理、教学组织、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去世之前提出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钱学森之

问”，归根结底也要追溯到这两个问题上。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列为未来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主题的核心。实践证明，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既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更需要进行大量实实在在的实践探索，高等院校应当把握教育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办学机制，寻找能够最大限度体现自身价值的办学定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特别是要深刻体会“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一未来十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温家宝总理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界也是一个严厉的警示。它警示我们：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身上缺乏道德的血液，那就不仅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生力军，而且还会成为危害社会的因素，其能力越强危害性就越大。因此，高等教育在不断强化需求导向、职业教育、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学生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应当把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把培养人才、科学创新、服务社会、传承人类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使高等学校不仅成为知识的发源地和汇集地，还要成为现代大学之父洪堡所说的“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典范”。

山东工商学院作为一所仅有二十多年建校历史的地方性财经院校，诞生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并始终处在改革之中，不仅经历过1997年和2003年教育部组织的两次本科教学评估，而且还经历了1998年学校主管部门的划转——由部属院校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由此带来学校由原来的行业性院校变为地方性院校，学校定位、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学校对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两个教育基本问题进行了多年的思考、研究和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建设有特色开放式工商大学为主线、以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为主题、以培养具有新儒商精神、具备新儒商素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办学思路。多年来，学校一直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培育，在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探索。我校公共管理学院从2005年开始，率先在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专业开设了《中外文化经典导修》系列课程，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经典讲座》、《辩论之道》、《中国传统礼仪礼俗》、《中国儒学史话》和《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等选修课程，同时还成立了“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外文化经典教研室”，逐步建立起一支学历高、素质强、业务精、专兼职结合、校内外结合的教师队伍。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也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关注，学校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并在2006年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将《中外文化经典导修》系列课程作为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中。2006年山东省高校德育工作评估组对公共管理学院开展的经典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此,学校开设的人文素质类课程不断增加,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参与的部门和教师不断增多,选修此类课程的专业和学生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包括必修课、限制性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在内的课程群。全校围绕学习经典、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学生活动逐渐增加。2009年我校积极组织承办了全国“中华诵·2009经典诵读大赛”山东省烟台分赛区的比赛,我校师生在初赛和全省决赛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我校经典教育工作给省语言文字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和大赛评委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2010年我校被教育部确定为“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单位,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在学校统一组织协调下,整合了全校相关院部的课程资源和师资力量,配合学校培养新儒商精神、具备新儒商素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形成了由经典导修、经典诵读、经典应用三大模块组成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系列丛书,就是与我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相配套的教材,也是我校教师多年改革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虽然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是教师们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更是一群热爱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锐意改革与创新精神的体现。我相信,只要有了这种锐意改革与创新的精神,不仅山东工商学院的教学改革会取得长足进步,长期困扰教育界的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编者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主题,并提出“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的战略重点。

山东工商学院自建校以来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更新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经过25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办学定位更加清晰,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学校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完善。2005年之后,学校加大教学研究和教学投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和学科布局,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改变传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学校明晰了以建设有特色开放式工商大学为主题、以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为主线的办学思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为地方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研究和构建了高水平的教育教学体系,针对社会对高级经管类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提出培养理性与灵性并存、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兼备、有德有才、并具有新儒商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特别强调基本素养、学科素养和应用能力三方面并重,追求人才培养的独特性,着力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五大教育教学平台:思想道德教育平台、通识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实践教学平台、能力培养平台,并为此设计了相应的教学环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系列教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满足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需要,在多年研究探索的基础上编撰而成。

本套教材分为三大系列:经典导修系列、经典诵读系列、经典应用系列,每个系列自成体系又互相联系。

经典导修系列教材主要从中外文化的源头着手,精心选择经典内容并对经典文献做必要的注解。全套丛书包括:《儒家文化经典导修读本》、《道家文化经典导修读本》、《佛家文化经典导修读本》、《诸子文化经典导修读本》、《文学艺术经典导修读本》等。这个系列教材最大的特点是经典性和系统性,使读者能直接与中华经典文化亲密接触,并在整个文化及历史

的大背景下理解经典,用心灵去深切地感受中华经典文化的基本精神,获得全面、立体的系统认识。这套教材不仅在内容方面有很高的层次和境界,而且为读者学习和理解中外文化提供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经典诵读系列教材主要是按照国家“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的要求,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传承民族精神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等方面着手,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而组织编写的,这套丛书包括:《唐宋名家词选读》、《中国新诗名作选读》、《朗诵艺术技巧与经典诗文朗诵指导》、《普通话技能训练与测试》、《中国书画鉴赏》等。这个系列教材的特点在于内容编写生动形象,既能满足教学需要又适合学生自学,既重视提高学生鉴赏水平又重视学生朗诵技能的锻炼,是一套融诵读、欣赏、练习于一体的优秀教材。

经典应用系列教材主要以中华经典文化为基础,充分挖掘中华经典文化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精神养分、工作和生活的智慧,注重经典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应用。这套丛书包括:《中华经典与现代社会》、《儒商之道》、《孙子兵法与战略管理》、《儒家经典与生活智慧》、《道家文化与管理哲学》、《易经与管理决策》、《黄帝内经与企业生命周期》、《佛教经典与现代社会》等等。这一系列教材形式多样、丰富有趣、通俗易懂,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来解读中华经典中所蕴涵的智慧,使读者在欣赏经典的同时享受着无穷的乐趣。

总之,这套《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系列教材》不仅是山东工商学院几十年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中华经典文化的汇集,使我们在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体悟中华经典文化中包含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也以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民族自豪感、开阔的视野和对不同文明的理解力与包容性,从而获取人生智慧,培养健全人格。在此,也衷心希望热爱中华经典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与我们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人才培养作出更大的贡献。

培养具有大国风范的高素质国民

傅志明

—

每当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所处的时代,展望我们将面临的未来的时候,都不能不面对以下三个事实:一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日益强大了起来,已经发展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中国和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已经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想知道中国对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今后又将怎样进一步影响世界;二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加深,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相互理解的需要日益增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相互之间在制度上、文化上、风俗习惯及思想感情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是鸿沟,对相互交流与理解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三是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进入中国的程度都不断扩大与加深,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福祉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但在我们的身上仍然留有昨天的印记,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生存与发展能力,都是在与此很不相同的过去环境中培养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用过去的眼光、从我们自身的条件出发看待将要面临的一切,误解与担心由此而产生。这三个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

我们要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被世界所理解呢?很显然,我们既不能要求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也不能要求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传统,也不符合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共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意愿,更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的传统是“君子求诸己”,是“人不知而不愠”,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求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更好地让我们理解,就是求诸人,是己不欲而施于人。这只能使世界与我们更加疏远,只能让世界对我们更加充满疑虑。

要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正确的方法不是告诉世界我们不是什么(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而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是什么。因为无论怎样解释我们不是什么,世界也不会因此就更加清楚我们究竟是什么,也不会因此而更加理解我们。这种解释太多了,反而会使人心生“此地无银三百

有所不同的,是与世界“和而不同”的一分子,而不是消解了独特性,与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没有差别的“同”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改变,不过是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子孙后代培养成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我们——展示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展示我们的内在精神与情感,展示我们的伟大理想与追求——且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与传统具有较强理解力与包容性,能够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共处、携手并进、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世界性公民。这样的世界性公民不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与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更加频繁的业务往来,在全球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乃至就业等等,也不仅仅是在政治意义上与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多地受到国际政治思潮与活动的影响,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更加关注甚至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使过去仅仅局限于国内甚至是局部地区的孤立的声音与行动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越来越与遥远异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声音与行动相互呼应,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世界性公民的世界属性。但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层面,那还只是一个被动的、被全球化潮流冲洗而成的世界性公民——严格地说则应当称之为被世界化了的甚至仅仅是贴上了世界性标签的公民,也就是被卷入世界潮流中的国家性公民。这样的世界性只是表面的,在炫人眼目的外表下掩藏着的,可能是与真正意义的世界性尖锐对立的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样的世界性所引起的可能是猜疑、排斥甚至冲突,可能是殖民、掠夺与战争,可能是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之间更深的隔阂与相互孤立。概而言之,这样的世界性带给我们的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不就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世界,获取世界性利益与支配地位而引起的吗?当今世界基于力量平衡的和平下的各国利益博弈,在狭隘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与战争,是难以预料的。特别是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来并有效发挥作用期间,狭隘民族主义能否膨胀演化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战争和灾难,更是不容乐观。

一个充满猜疑与冲突的世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受狭隘民族主义支配,饱含战争风险的世界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交织着歧视、掠夺、仇恨与恐怖主义的世界更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共享和谐与繁荣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有人或者神赐给我们,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和创造。而要创造这样的世界,了解和学习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培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精神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二

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并不在生理上,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理解也不在生理的意义上,而在心理与精神的意义上。所以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民族与国家层面,理解的意义都是心理与精神上的。而这种心理与精神上的差异,则是文化的、历史的,是受不同



环境的影响和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所以,只有文化意义上的、也就是国家与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的理解才是真正意义的理解,也只有文化意义上的、也就是国家与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的交流才是真正意义的交流。除此之外,无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民来往多么频繁,交往的人数多么众多,接触的范围多么广泛,都只不过是交往或者交易而已,除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利益的追求,不会增进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更不会使我们更加相互尊重。相反,这种基于猎奇心与逐利心的交往,也是建立在利益不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意义上的交往固然也能增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也引起了无数的冲突与战争,并且引起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增进理解与尊重的可能性。西方殖民史就是这样一部基于猎奇心与逐利心的人类交往史,是典型的以战争促合作的血淋淋的历史。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并不少于建设,所造成的苦难更是远远超过给少数殖民者带来的快乐。殖民地那些饱经苦难的心灵不仅没有因此而开出馨香的文明之花,而是深深地种下了蓬勃的仇恨之草,铲不绝,也烧不尽,几百年过去了,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苏生和蔓延。在人类的历史上,又有几个民族没有类似这样的苦难记忆和精神创伤呢?如果全球化仅仅是拓展和扩大了人类这种基于猎奇心与逐利心的交往与交易空间,那将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人类过去充满苦难与仇恨的交往史而已,并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世界各族人民脆弱的神经,唤起一幕幕苦难的民族记忆,揭开并未完全愈合的精神创伤。人类目前面临的诸如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种族仇恨等全球性危机与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过程,不都交织着这种记忆和创伤吗?可见这样的交往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魔鬼的诅咒,很难预料。

要避免这种不确定性,除了努力促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意义上也即是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之外,别无他途。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世界并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除了增强我们在文化意义上、在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与世界各族人民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之外,也别无他途。而要增强这种在文化意义上、在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与世界各族人民沟通、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除了加强中外文化教育,让更多的国民经受世界各族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的洗礼之外,同样别无他途。这正是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实质上就是在中国不断崛起成为世界性主要大国,日益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进程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逐步实现的今天,培养与中国在世界上拥有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相称,能够有效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作用,能够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广泛认同的高素质国民。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将要面临的未来要求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要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为全体国民的职业发展与人生幸福服务,而且要为中国走向世界,发挥世界性大国应有的作用,与世界各国人民有效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共享繁荣服务。简言之,我们所要培养的高素质国民,不仅要能够满足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每一个国民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应当具有一种大国风范——一种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国民所曾经有过的、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世界人民期待的全新的风范。这既是我们更好地融入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国际生存与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提出的正当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各民族的记忆中,一种世界性力量的崛起往往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强力意志,对现存的世界总是充满敌意,常常需要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新的平衡。最近一百多年历史上人类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典型的事例。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所以对每一种世界性力量的崛起,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满疑虑,同时也满怀期待。能否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这种疑虑与期待,进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使命与责任,并把这种认识和理解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出具有大国风范,能够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广泛认同的高素质国民,对新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将走出一条怎样的崛起之路,将怎样利用所获得的力量与大国地位,怎样发挥世界性大国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打上怎样的烙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才对世界性大国通过征服与杀戮而崛起并以武力威临世界的邪恶本质普遍有所认识,才把妄图通过征服与杀戮获得对他国人民、资源与财富的支配的帝国统治者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反人类的魔鬼和战争罪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那些同样通过征服与杀戮而开疆拓土的统治者们,无不因其伟大的征服而备受赞颂,成为诗人、作家、历史学家竞相歌颂的对象,成为政治家、将军乃至野心家崇拜的偶像,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英雄。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对征服者的崇拜史就有多长。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征服者崇拜文化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征服者。历史地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帝国,都不是某一个人乃至某一个集团心血来潮时强加给他的国家和世界人民的,而是他的国家历史地造就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野心家造就了帝国,而是帝国造就了野心家。野心家只不过是帝国的土地上长出的邪恶之树结出的邪恶之果罢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野心家都是他的祖国、他祖国的人民有意识培养的,不能说他的每一位同胞都赞同他、支持他,而没有反对他的力量,但在他的灵魂中种下的野心家的种子及其赖以生长的土壤乃至阳光雨露,毫无疑问都主要来自他的祖国,来自他祖国的人民,来自他祖国独特的征服者崇拜文化和社会历史环境。不仅如此,他作为征服者的舞台和力量,也都是他的祖国和人民给予他的。所以,在野心家成为野心家之前,他的祖国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在精神上帝国主义化了,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具备了使他成为野心家的条件,甚至早已经是帝国精神的化身了。人类这种普遍而久远的征服者崇拜文化即使在今天,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各国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依然是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在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思想意识、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而作为一种历史形态,更会永久性地留在人类的记忆中——或深或



浅。

这种征服者崇拜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业已存在的文化生态自身的传播繁衍之外,教育无疑是最主要的作用机制。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文化生态所具有的自我传播与繁衍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教育机制。离开教育,任何文化都将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因此,要改变人类这种普遍而久远的征服者崇拜文化,唯有通过教育,通过培养消除了征服者崇拜意识和心态,致力于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谐相处、合作发展、共享繁荣的大国国民,并进而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方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培养具有大国风范的高素质国民,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世界各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

三

我们所要培养的具有大国风范的高素质国民,无疑首先应当是中国的国民,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我们——展示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展示我们的内在精神与情感,展示我们的伟大理想与追求,并能够使世界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作为世界之“和”的一分子的中国国民。但与此同时,他/她也应当是具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与传统具有较强理解力与包容性,能够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有效沟通、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共处、携手并进、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世界性公民。而无论是作为中国国民还是作为世界性公民,都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与经济意义上的,而主要应当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民族心理与精神意义上的,因而与民族虚无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与各种各样的狭隘民族主义(无论是自大式的还是自卑式的)也是格格不入的。他/她既不会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自轻自贱;也不会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自高自傲。他/她是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代表,在他/她的身上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并为自己是中国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他/她同时也是世界性公民,是人类的代表,就像珍视中国文化一样珍视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并为自己作为人类之一员,为人类文明的多姿多彩,为世界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感到自豪和骄傲。

培养这种具有大国风范的高素质国民,更确切地说是培养这种大国风范,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长期努力,而不独是教育的责任,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无疑赋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尤其是在这种理念形成和传播之初,在它为社会广泛接受并自觉付诸行动以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发挥文化创新与思想启蒙的作用,并通过自身改革,努力将其融入整个职能体系之中,使大国风范的培育成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当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受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变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个人职业发展特别是初次就业需要对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功利主义乃至工具主义对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十分普遍,其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并且越来越不可忽视,我们更不应当忽视教育尤其是高

等教育肩负的这一特殊历史使命和责任。否则,我们不仅会失去历史,也很可能失去现在。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出于对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怎样的国民去创造和把握未来长期深入的思考,我们从2005年起开始尝试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中外文化经典导修”系列课程,让学生学习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价值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原创性著作,深入中外文化的核心,以期达到以下几方面目的:(1)将学生引向人类文明及知识的最高境界,有一个尽可能高的起点、尽可能宽的视野和尽可能广的胸怀;(2)感受大家风范,培养大家气象;(3)培养历史感、对不同文明的理解力与包容性,以及全球眼光;(4)获取人生智慧,培养健全人格;(5)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文精神;(6)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探究性思维和探究性活动训练,培养科学素养和进行探究性思维与活动的能力;(7)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开发与自我管理;(8)通过背诵中外文化经典,在真正拥有经典的同时,提高中外文化水平。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经典导修教材,就是我们在总结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拟编写的《中外文化经典导修》教材的第一部分——《中国文化经典导修》教材,共包括四本:《儒家文化经典导修》《道家文化经典导修》《佛家文化经典导修》《诸子文化经典导修》。2010年山东工商学院被教育部语用司确定为“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单位,试点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整合原有课程资源的基础上,在全校范围内推出“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系列课程,《中国文化经典导修》则是其核心课程之一,我们编写的这套《中国文化经典导修》教材故而被纳入“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系列教材,该系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套教材即将出版之际,谨将我们的有关思考表述出来,既是对读者的一种交代,更希望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古人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云:“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中国虽然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但已经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在凸显,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是到了认真思考我们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和把握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应当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培养成什么样的国民的时候了。

2011年8月28日于烟台

编选说明

修读儒家文化经典,首先需要了解儒家文化都有哪些经典,对于普通读者和非中国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又应当修读哪些儒家文化经典,是需要全部修读,还是可以选修其中的部分内容,应当达到怎样的水平,作为一个初学者,怎样克服语言文字、思想内涵、文化知识等方面的障碍。本书正是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以期与普通读者和非中国哲学专业大学生提供一本了解儒家和儒家文化的普及性读物。

稍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会知道,儒家文化经典有“四书”、“五经”(或“六经”)与“十三经”等说法。而何谓“四书”、“五经”、“十三经”?三者之间在历史上是如何传承、分合的?各自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地位与影响又如何?这需要做一些说明。

儒家经典事实上并非儒家“一家之言”,而是包含了孔子以前中华民族创造的主要文化遗产和孔子及其后学者创造的儒家文化典籍。“四书”、“五经”(或“六经”)、“十三经”三种说法,最早出现的是“六经”。因汉武帝之前,儒家并没有上升为官学,所以一般称之为“六艺”,即使有时称之为“经”,也没有后世那种神圣经典的意味,更不是儒家一家的经典,而是诸子百家共同的经典。《庄子·天下篇》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由于儒家创始人孔子比其他各家对“六经”更为重视,不仅系统地整理了“六经”,使其更为儒家化,而且将其作为必修经典用以教育学生,确立了“六经”在儒家典籍中的核心地位,本是百家共同经典的“六经”后来便逐渐演变为儒家的经典。由于《乐》书在流传中亡佚,“六经”便只剩下“五经”流传下来。西汉时,以《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五经”的说法才正式出现,并上升为统治者、学人士子、平民百姓共同尊崇的经典。因《春秋》经有三家作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包含“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所以又有“九经”之称。唐朝时,这“九经”皆被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时期,又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将“九经”扩展为“十二经”。唐文宗于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组织当时的硕学鸿儒和著名书法家花七年时间将这“十二经”刻于石碑,至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完成,称为《开成石经》,于是有了第一个皇家权威版本的儒家经典并流传至今(《开成石经》碑刻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宋两朝特别是宋代,伴随着佛道两教的刺激,较能系统地体现儒家义理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逐渐受到重视。至南宋,朱熹为此“四书”作注,“四书”的说法正式出现,并于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自是,《孟子》上升为经典,与晚唐即已确立的“十二经”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儒家经典体系——“十三经”。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十三经”,其经书地位及其社会影响都与儒家在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具有直接的关系。“五经”(最初为“六经”)虽然成书很早,并在孔子时期就确立了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但由于儒家在当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且不受统治者重视,“五经”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因为受到儒家推崇而获得的,也并没有获得后世那样的崇高经书的地位。“五经”的经书地位真正形成、巩固是在汉唐,特别是唐承隋制以“明经”科取士以后,其崇高的经书地位才最终形成。“四书”则是唐宋特别是宋代形成的,从元代开始成为科举考试指定教材,地位开始超过“五经”,成为儒家最核心的经典。《孝经》则是因唐朝强调以孝治国,特别是唐玄宗亲自为之作序以后才确立其经书地位。《尔雅》则是一部训诂之书,是纯粹的工具书,虽然自晚唐开始也被尊崇为经,但与其他经书不同,其价值不在思想方面。

“十三经”代表了儒家个人立身处世、家国天下的方方面面,是儒家全面安排社会人生的经典,更是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精神内核。要想全面理解儒家与儒家思想,深研“十三经”是必经之路。但对于普通读者和非中国哲学专业、也不想以研究儒家思想为业的大学生,全面系统地研读“十三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只需要对儒家思想体系有一定的了解,对儒家的基本精神内涵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对儒家的产生、发展、社会影响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把握,能够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运用儒家智慧指导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也就足够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采取以儒家基本经典为核心,辐射整个儒家文化及其影响的方式进行编选。基本经典编选的范围确定为“十三经”中除《周礼》、《仪礼》和《尔雅》之外的其余九部经典,加上在中国思想史与儒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荀子》。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其他重要儒家典籍则与研究文献一起作为导修内容进行编选。按照其重要性和不同的修读要求,又将基本经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必修经典,第二部分为选修经典。为了帮助读者用历史的眼光和广阔的文化视野认识和理解儒家与儒家思想,了解儒家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及影响,特地编选了第三部分《儒家与中国文化》。

第一部分必修经典是本书的核心,是认识和把握儒家思想体系与基本精神内涵所必须深入研读的内容,也是进一步学习儒家其他典籍的基础。我们认为“四书”是最合适的,所以编选了“四书”全文。因为相较于同样重要的“五经”,“四书”不仅更浅显,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也更加紧密,其内容涵盖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几乎所有方面,所以自南宋起就被看成是教人做人、做事、做学问,成就儒家理想的圣贤人格必读的教科书,自宋元以来就是中国社会上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儒家经典。用南宋朱熹的话说,“四书”是进入儒学“六经”堂奥的“阶梯”,“若读得此四